

# 奥运之路，我们如此走过

1984年,《新民晚报》特派记者卢璐赴美采访奥运会,成为上海滩现场采访奥运第一人。从洛杉矶奥运会至今,时光跨越了23年,我们经历了

6届奥运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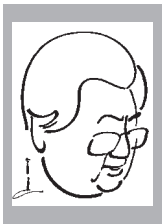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民晚报》的奥运报道,从最初的电话口述、传真传稿、铅字排版,进入了电脑时代。奥运报道的规模,也越来越大。

汉城、巴塞罗那、亚特兰大、悉尼、雅典的足迹中,有我们的特派记者徐世平、彭正勇、秦天……他们的报道,留下了6届奥运的精彩,也留下了晚

报奥运报道的轨迹。

回忆,是琐碎的,但从前,是一种见证。回眸,是纪念,也是憧憬。明年,北京,我们的第七次奥运报道,又将起航。

## 回首洛城奥运



奥运会可称是人类最重大的节日,两周比赛牵人魂魄,成为全世界亿万民众目光和关注的焦点。

我万分有幸,在1984年受报社特派到美国洛杉矶采访第23届奥运会。在本报历史上,特派记者是首次,派到国外更是破天荒首次。按以往上海报社档次来分,三报两台排队之次序,本报忝居第三位。出国采访,几乎没有耳闻。但羊城晚报赴奥运记者到本报体育组讲述他们获得批准过程时,我似乎一下子被怔住了:我们新民晚报号称晚报之首,为什么我们不去争取,难道我们放弃这样百年难遇的奥运采访?

时间太仓促了,从说服报社领导到去国家体委争取名额,再电传奥运会报名,申请护照、签证等等,总共只有一个来月。

这时,我想首先要说服报社领导同意,他们答应了,我再一关一关地过。感谢以束纫秋为首的编委会支持我,立即令我飞北京,到国家体委讨名额。我自1955年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即到国家网球队报到,所以国家体委高层都熟悉,这次我赴京请命,他们大力促成,于是顺利通过一切手续,飞回上海。

7月28日至8月12日,第23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行。我随中国代表团三百余人的专机由上海飞抵旧金山,这时,我意识到一场硬仗将要展开:我将积聚所有精力,动员每一根神经,为报道好这次奥运会作出努力。然而飞行带来的头疼,似愁云压顶,我想:临阵衔命,仓促上阵,单枪匹马,应付得了奥运如此重大的报道吗?

一个忠于职守的记者,永远没有难字当头。我凭着记者灵敏的本能,广交朋友,到处可觅新闻线索。在奥运会浩瀚大海中,我认定我国运动员优势项目,紧跟不舍,又由于我平日和运动员经常接触,大家成了朋友,我常去他们宿舍,坐在他们床铺上同他们聊天。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每次破纪录后,对我说:你了解我,随你怎么写,我都没意见。这样的运动员,他们的心扉总是向我敞开,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,在国家网球队和上海网球队当过十年运动员教练员,这是我的基本功。

每届奥运会,都是世界记者的聚会。我碰到持有正式证件的有八千多人,还有五千多无证件的活跃在赛场,为全世界发布消息。

我国记者有六十多人,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台、国际台、体育报等都是大部队作战。而我、中国日报蒋维良、羊城晚报苏少泉、中国建设饶凤歧等都是个人奋战。记者的责任感在对手如林、争分夺秒的场合下,鞭策我们勤跑多问少睡觉。新闻中心是我每早必到之处,可以拿到成绩和预报,还有当场转播,供选择的参考。

晚6时,是我和上海通话时间,我把写好的稿子传过去,他们把要求告诉我,让我踏实度过每一天。晚上还有球赛等着我,又匆匆融入在喧闹的人流中了。

奥运接近尾声,闭幕式白天,我在新闻中心走走,突然一架摄像机向我推进,原来是韩国电视台采访,问我:下届奥运在汉城举行,是否有兴趣去?我答:我今年51岁了,再过四年,也许我退休了,但《新民晚报》一定会派记者来的。谢谢你的邀请。 卢璐

大约十年前,我就发誓,再也不蹚体育的浑水。但是,说归说,做归做。总是拿捏不住。其间的原因,有一首叫《从前》的歌写得明白无误:“每件事都有记忆点,想越多越感谢,如果能重新再年轻一遍,我们还是要一起飞,不准任何人挡在面前……”

上海的《新民晚报》要做一个北京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特刊。体育部相约,要求“随便写点感想之类”的东西。从1988年到1996年,我曾受《新民晚报》委派,采访过三届奥运会。千头万绪,无从说起。汉城、巴塞罗那、亚特兰大。从前留下的记忆点是什么呢?我将其归结为“三个年代”。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,意味着我们曾经一起走过。

**码字年代。**1988年,我受报社委派,单枪匹马去韩国汉城采访奥运会。当时,《新民晚报》破天荒地辟出了两个半的版面,试图全方位报道奥运会。因此,一个特派记者,便承担着巨大的发稿量。我们当时仍然处于手写新闻的时代。我记得,我在行李中带上了500张《新民晚报》的稿纸(每张纸300字),分量不轻。

## 从前是一种见证

然而,不到一周,这些稿纸,全部用完了(当然包括撕掉的)。我急中生智,每天去新闻中心,将成绩公告单拿回来,翻过面来写,也当是“废物利用”。我印象之中,当年采写的大部分稿件,几乎都是用这种“再生纸”写的。手指的老茧,厚重不堪。这是一个码字的时代,一个需要奋笔疾书的年代。你几乎很难想象,一个人,怎么可以用笔写出这么多文章!奥运会结束之时,我在房间里扔掉的旧稿纸,差不多有一米多高。这些稿纸,都是通过比赛组委会提供的传真设备,并在付出高昂的费用之后,一页一页传回报社的。其中的心血,可想而知。我就是用这些“再生纸”新闻,见证了著名的“约翰逊事件”,也见证了中国奥运军团“兵败汉城”。

**传真年代。**1992年,我再次受命前往西班牙巴塞罗那。这一次去西班牙,我自带了一个袖珍



的传真机。这种传真机,有一个特别的装置,它不用接线,可以直接用听筒,采用转换的方式,将稿件传回报社。这种传真机,重量只有一本辞海的分量,可以随身携带。只要有电话线的地

方,便可以使用。奥运会第一枚金牌的诞生,以及中国奥运会代表团获得的第一枚金牌等新闻,我都是用这种方式传回国内的。我记忆之中,《新民晚报》体育部一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。从第一个可以录音的电话,到第一个可以拾音传真的传真机,以及后来的第一台电脑,体育部都是“吃螃蟹者”。我以为,这也是《新民晚报》体育报道一直领业界风气之先的重要的物质基础。

**电脑年代。**1996年,当我们去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采访之时,手中的设备,也早已鸟枪换炮了。其实,从西班牙回来不久,《新民晚报》体育部已开始使用电脑。1993年,我去美国迈阿密

## 初次大战最难忘

在我的十几年体育记者生涯中,经历过洛杉矶、汉城、巴塞罗那、亚特兰大、四届奥运会。每逢奥运会来临,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都会使出浑身解数,争取给读者、听众或观众提供一份新闻奥运“大餐”。

在我的奥运报道记忆中,最难忘的是洛杉矶奥运会的报道经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新民晚报复刊不久,当时的报社在九江路外滩的一幢老楼里办公,办公室很简陋,冬天生炉子取暖,酷暑买冰块降温,新闻采访的手段、条件更是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的,体育部当时最“现代化”的设备,就是一部长途电话和一台传真机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

当年,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大家庭中的地位、影响还没有今天这么高、这么大,再说,国家开放的步伐也比当今小得多。所以,偌大一个上海,赴洛杉矶奥运会现场采访的仅有新民晚报卢璐一人。

说到卢璐采访奥运会,不能不说时任报社总编辑的老束。在老束的倡导下,体育报道一直受到关注,在老束的办报思想中,体育报道是报纸的四大支柱之一(其他三大支柱是:社会新闻、文化新闻、副刊),因此,尽管当年报社的外汇结余少得可怜,然而为了奥运采访,报社还是果断拍板:为奥运会采访,这钱值得花!

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运会的首次亮相,是那届奥运



会的一大亮点,中国奥运健儿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记得,从开幕式,以及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、女排姑娘勇夺冠军,甚至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奏响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

的乐曲,都引起了轰动。卢璐在前方将一篇篇稿件或用传真或用国际长途“传”到报社,后方体育部的记者们一刻不停地将这些信息整理成稿件送至排字房。1984年的时候,还是“铅与火”的时代,每篇稿件都要靠排字工人一只只铅字排出来。编辑部当时在4楼,排字房却在底楼,而当时的报社仅有一部老式电梯,为了不延误出报,接到卢璐的传真稿,部里的记者往往都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到楼下,送到编辑手里。假如是电话来稿,有人速记,有人送稿,几乎是记满一张稿纸,送稿的记者就直冲楼下排字房。当时,体育部的记者都处在临战状态,个个都甘当“二传手”,尽管版面上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,他们都甘愿当无名英雄。生怕前方来稿在自己手里多耽搁一分一秒。这种团队精神至今还是新民晚报体育部的一个好传统。

今天,时代发展了,社会进步了,体育记者们可以有大有作为。但是,我们的心中永远要有读者、读者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追求!

彭正勇

## 奥运碎片



七年前,悉尼奥运会。三年前,雅典奥运会。过去的时间都不算太久。但在记忆中搜索,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,只剩下了一些零零落落的碎片。

2000年。悉尼。一天清晨5时。记不清是没睡,还是一觉醒来,发觉阿顺不在屋里。后得知,怕漏新闻,他去了新闻中心。其实,来悉尼后,他天天如此。凌晨二三时,刚发完稿,又赶去新闻中心。我们在郊外租了一幢小屋,离新闻中心不近。就算不干什么,一个来回,也要一个小时。去了,就不会不干。凌晨5时还没睡,八九时又有新的采访任务。几点到几点这个比赛,几点到几点那个比赛,采访完还要写稿,连轴转得厉害。一天就二三十时的睡眠,接连十五六天,就是铁打的,也撑不住。

为此事,有点恼火,厉声对阿顺说,领导在这里,漏不漏新闻,报道好坏,领导都会担着,你用不着神经紧张,压力太大,整天里不睡不吃的。阿顺听着,不应不答,只是笑笑。

阿顺依旧发完稿后,去新闻中心逛一圈。阿顺,大名黄永顺,熟悉英语,熟知奥运会的方方面面,工作责任心强。采访悉尼奥运会,还有汤世芬、李方和高兴。他们也很优秀,也很拼命。拼命,尤其是奥运期间的拼命,

是新民晚报体育部的传统,历来如此。当然,最拼命的是阿顺。最难能可贵的是,阿顺的拼命,是在台下,是在幕后。凡是不显山露水的,又苦又累的,既费时间又耗精力的事,十之八九,是他干的。

悉尼。租屋附近有一家匹萨店。初来乍到,人地两生,时间又紧张得不够用,所以,开始的时候,天天吃匹萨,但实在消受不起,觉睡得不多,一天只吃一顿,最多吃两顿,再吃不好,那可不行。一天晚上,叫上阿顺、高兴,开着车就走。

二十来分钟的时间,就在一个商业区找到了一家中国餐馆,老板老板娘都是上海人。那顿晚饭,吃得挺爽。之后,几乎每天都去吃一顿。在那里还碰到了吕凉和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徐静蕾,还碰到了又拿了冠军的占旭刚,得到了意外的采访机会。

四年后雅典奥运会,新民晚报去了一个七个人的团队。当领导的,将工作节奏安排得紧凑一点,尽可能地让记者少走冤枉路,少写废稿,尽可能地多挤一点时间,让记者睡觉,这是其一。其二,一天一顿,这顿一定要吃饱吃好。特派记者,都很优秀,在具体采访写作的业务上,并不需要领导操心。当然,还有一条也很重要,那就是在这个团队中营造一种和谐快乐的气氛。领导做好这三件事,奥运报道的成功也就八九不离十了。 秦天